安宁的环境

□艾 吉

我和许多乡村人一样，长时期生活在安宁的环境。与今天相比，那是物质贫困的年代。时间的流逝是缓慢的，看日头从东边山头升起，就是一天的开始；看月亮星星镀亮夜空，又是一天的收尾。像蚂蚁走路，每天都是差不多相同的脚步。在那样的环境，时间似乎是多余的，只消凭直觉或经验，就知道每时每刻要做什么，远的说，就知道每天、每月、每年要做什么，人是不慌不忙的、从从容容的、松松弛弛的。不需要看日历，用眼睛和心灵的感受，不出丝毫的差错便明白，四季的轮回交替、风路过的方向和痕迹、花开花落的声音、云雾变幻的细节、庄稼拔节的过程……人当然照常面临着疾病的折磨、死亡的召唤，也有饥饿的威胁。但人的心灵是在一种没有重负的状态下，面对着日常生活的有序的运转。

世界曾经亦如此，中国曾经亦如此，反正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曾经这样生生不息。有人将这种状态称为“田园牧歌”。当然，可怕的战争一直伴随着人类。然而，真正打破这种和谐的，是从浩浩荡荡的工业革命开始。从此，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的小小的星球上，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无可抗拒的轰鸣。

之后的几百年，尽管工业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世界旧有的秩序，可是，安宁的环境以其固有的根基与势力，维护着许多地方万事万物存在的规律，尤其是在偏僻乡村。

我出生的村庄，由于处在被一座座大山分割天空的封闭的角落，不要说外界人们的足迹没有过早地伸入进来，就是那些四处浪迹的风和鸟们也很少从远处带来几丝影子。

村庄的孩子们刚一出生，就成了大地的一员。哭一阵后，没人再愿意听你没完没了的哭，在大自然的怀抱，你搞不了什么特殊化，一棵树怎么活着，你就得学会它的坚忍；一把泥土怎么强盛，你就得吸取它的营养。哈尼族的娃娃，到一定时候，母亲就要背在身上，到田边进行象征性的劳动教育。这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在那里，母亲说的话，不含半点长大后如何收起手脚享清福的意思。母亲说的是财富和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你要学会挖田种地，要学会坦坦荡荡做人，要学会忍受一切不幸，你的骨头要比石头还硬。

人每天接触的是大自然，因而哈尼族的神灵都跟大自然密切相关，每一种事物都有相应的神灵。表面上，他们是神秘的，其实是生活化的、人性化的，并不高高在上地引导人们。他们的名字，跟现实中人们的普普通通的名字一样。人们对神灵的膜拜，实则是感恩大自然给予了安宁的环境。

山是绿的，水是清的，天空是蓝的，雾是白的，空气是干净的，庄稼是饱满的，畜禽是肥壮的，人们是相爱的……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恩赐。

人们没有征服大自然的雄心壮志，人们只有把大自然看作亲爹亲娘的孝心。

我想起我的童年时代。

每天一早，我就跟找食吃的猪、鸡出门，与一窝同样放野的孩子放开性子玩，玩得忘记回家。经常是母亲在门口喊吃饭，喊哑了嗓子，装作没听见，最后是父亲提根荆条，找到了便二话不说地抽打，哭泣着跟在他后面回家。吃了早饭，又溜出家门，再重复同样的闹剧。有时，早上才穿的新衣服，下午就撕成几片，在风中飘扬。有时，玩得实在过头，不敢回家，急得父母反而要哄着领回家。

夜晚的星星月亮下，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玩游戏、唱歌、跳舞……有各种好玩的，真可谓“五花八门”。

我家旁边有棵非常高大的万年青树。早上，女人们忙家务活，许多男人则集中到万年青树下，抽烟筒，讲古，热闹得灰尘都跳起舞。如果不跟小伙伴混了，我就听这些年纪大大小小的男人讲古。他们什么话题都讲，像摆一桌山茅野菜，只要蘸进蘸水里，就有说不出的开胃。

我的外婆，经常在我家。她是出色的民间文学高手。她会讲很多故事、神话、传说。她一来，我就缠住她不放，叫她讲，有的讲过多遍，但每讲一次我都听得入迷。她很善于营造气氛，鼻子是鼻子，耳朵是耳朵，好像真的一样，有时讲到恐怖处，我害怕得紧紧钻进她的怀里。

我就是在这种无拘无束、自然奔放的环境中成长。

被世界遗忘的村子，白天是鸟叫声和公鸡的打鸣，深夜又有时梦时醒的狗咬破恬静，还有万年青树上和村边树林里熬夜的猫头鹰的咕咕声。

大树上，到处都是喜鹊与乌鸦的家。

古歌里唱道：“天边飞来的三对喜鹊/请你们歇在寨脚的大树上/你是哈尼人的好伙伴/愿你天天保佑寨子的平安。”

野猫大白天都会钻进村里偷鸡。

夏天果子熟了，炎热的河谷，破脸狗（果子狸）成群结队。

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张开翅膀就像一片棕片似的飞着，树上爬、地下跑的动物还多着呢！

这种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做人还是写作，都在我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我跟着一位老人，放过半年集体的水牛。水牛爱到处跑动，刚刚在你的眼皮底下，眨眼的工夫，像一阵风不见踪影。不管天晴天阴，每天，牛走到哪儿，人跟到哪儿。它们有的是力气，我有的也是跑几座山不会酸疼的脚杆。这是我辍学回家的日子。在跟水牛来往一段时间后，原先的梦想渐渐灰飞烟灭。我不再有怨气，水牛们是这样过来的，我的祖祖辈辈是这样过来的，老老少少现在还这样生活着，我为什么不能一脚泥土一身汗水地迎送每一天？

“牧人”这个身份，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奢侈太浪漫了。我可是地地道道的牧人出身。那时，我从来不会去想自己的这个身份，有朝一日作为人生的经历被不断回忆、怀念。在当时，我时常看着远处的县城，水牛看没看见县城我不知道，我呢，看过了就过了，只把心思用在水牛身上，上坡、下坡，平路、树丛，我都能够用各种姿势骑牛，而不摔下来。

后来，偶然的机会，我到一个叫么勺的哈尼村子教书。那里有红河县最高的鲁玛大山，山上全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么勺前后左右远离其他地方，像从山林一股奔流而下的泉水，是一块不受外界干扰、污染的土地。下午上完课后，我们就没事干了，不是到村民家里玩，就是在树林中漫步。说不清是寂寞还是宁静，鸟的歌喉、风的絮语就是村民们的家常悲喜。我们跟外界联系的，是半个月送来一次的报纸，是一台声音像蚊子哼叫的时有时无的收音机，是往远方酸疼酸疼地赶路的目光。

村民们所有的日常生活是自然的、简单的、古朴的、绿色的。去几个小时远的地方赶街子，做买卖，见点世面，是件大事。此外，整天都是围着这座大山，下田地耕作，上山干活。喝的水变成血，血又变成汗，汗干了又喝水，水又滋润血，生命就是这样不断地磨损，不断地补充。

村民和学生都称呼我们为“阿师”，这种亲切的称呼，我在别处从来没有听到过。凭这一声昵称，我终生都会把“么勺”装进心底，像小孩子把糖藏进兜里，躲开别人，隔一会儿甜甜地舔几口，咽口水馋馋地回味。

此刻，回过神，我醒悟过来，我在城里所沉湎的已是二三十年前的往事。我的楼底下，是每天都有上千人堵塞的农贸市场，从早晨一直到黄昏，乱哄哄的，乱得不能再乱。

这样的场面到处都是，是今日我们任何人回避不了的现实。过去，身在安宁的环境，但我不太明白“安宁”两个字的意义。当我明白过来，并且深知安宁对人是那么重要，我却离安宁越来越远了。

大段河

□丁 利

西河就在我家的村西，是一条长长的河，家乡人称之为大段河。

我家居住在科尔沁草原深处古老的大段屯，因有这条河而小有名气。这条河水草丰美，盛产鱼虾，过去挨饿时，粮食不够吃，鱼虾救了家乡不少人的性命。据说那时候西河的鱼特别多，品种全、个头大，想吃鱼那是小菜一碟，女人在家把锅芡好汤，男人拎着网到西河一网就是十多斤活蹦乱跳的鱼，然后拎回来就下锅，什么事都不误。一条最大的鱼有百斤重，放在大麻袋里还露出半截尾巴。那时的西河水草也是高高密密的，不像现在十年九旱，河水干涸成一条线似的，水草也稀稀拉拉，半死不活的。过去的西河，那才是自然之美、原始之貌，令人怀恋。

这条河给我童年捕鱼创造了无穷的乐趣。推网推、挂子挂、叉子叉、用手捉、鱼罩罩……用推网在河边的水草中一跑一推一端，那鱼儿就在网中蹦跳着，弄个十斤八斤鱼，也就是两袋烟的工夫。

那年大段河来了大水，把大段坝都冲开了。在滚滚的水流中那鱼都一个个往上跳高高。家乡人经不起鱼儿的挑战和诱惑，男女老少用各种方式开始下河捕鱼。

当时我家困难，连渔网、鱼挂子都买不起。父亲对捕鱼是个外行，母亲对捕鱼却极其投入，她连夜用竹钎子扎起鱼罩。母亲罩鱼的本事，一般男人也比不了。我的罩鱼技术就是母亲在西河里手把手教会的。记得有一次，在村后张木斯屯前的水泡子里罩鱼，那阵容很大，大约有百十号人，男女老少，在没膝的河水中罩起罩落，每个人身后的腰带上都系着一个大鱼兜子，里面是罩到的或多或少的几条鱼。我拎过母亲的鱼罩，饶有兴致地罩起鱼来。不多时，我在一片水草边缘一落罩，就听到里面咚咚的撞击声，我知道是罩着大个儿鱼了，就用身体把罩口使劲往下摁，通过上面的罩口，把手伸进鱼罩里，一摸不觉一惊喜，这么大的鱼，我的小手根本抓不住它。我回头喊在岸上歇息的母亲，说罩着一条大鱼，快来帮我捉出来。母亲迅速扔掉手里没吸完的半截旱烟，跑到我的身边。我母亲把手伸进鱼罩里摸了好几圈，费了好半天的劲，才把那条足有5斤重的鲤鱼，从罩里抓出来。母亲捉鱼挺有高招的，她一手紧紧扣住鱼腮，一手托着鱼身子，然后麻利地装进我带着的鱼网兜里。

四周不少人，看到我捕到这么一条大鱼，都不约而同地聚在我的身前身后，只听那“哗哗啦啦”的扣罩声，不绝于耳。

可是他们几十人，在我附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并没有收获到我那样一条大鱼。母亲湿漉漉的脸上绽放着笑容，她为自己的儿子感到自豪和骄傲。其实，儿子能有这样的超常发挥，有这么大的潜力，都是偶然的事，运气比较好罢了。

上世纪80年代，又一场大水冲进了大段河，家里买不起渔具，看人家有用网打的，有用挂子挂的，怎么办呢？我灵机一动，想出个既省钱又能捕捉鲶鱼的办法。

我花三五块钱，买了几百个小鱼钩，小鱼钩两分钱一个，非常便宜。我把小鱼钩用一条条丝线系在一条长绳子上，大约几米一个。然后把长绳子用两根高木杆固定好。这就形成了“钓鱼网”。每个小鱼钩上都挂个小蝌蚪，那是逗引鲶鱼上钩的诱饵。鱼钩放水里一夜，第二天一看，真是“满堂红”啊，一条条馋嘴的鲶鱼都被钓住了，也有特大的鲶鱼咬断丝线逃跑的。鲶鱼在当地是最贵重也是最好吃的，因为它身子滑，牙齿锋利，一般的鱼网很难捕捉到它，没曾想我的小小的鱼钩派上了用场。这回村子里父老乡亲全服了，都说别看老丁家穷，人家孩子想的招高，专门吃大鲶鱼呢！

不久，村子里又有很多人放下了渔网，也买来许多小鱼钩，下在河里捕捉好吃没刺的大鲶鱼，当然也都有不少的收获。

从此，我在西河边上捕鱼出了名，常常是背着渔具，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在河边走来走去。曾瞧不起我家的人，对我也刮目相看，就连十里八村出名的捕鱼能手大奎哥，也敬服我三分。

30年过去了，时光在水来水往中前行。不能忘的是，那河边留下我捉蝌蚪的小脚印，那河底留下我鱼竿插下的一个个小洞，那鱼钩上垂着滑溜溜的大鲶鱼……

每每回乡，都要情不自禁地到西河边走走，到鱼窝棚里的土炕上坐坐，来了兴致还要撒上几网，虽然很少打上鱼，但那乐趣，恰似又回到童年，一说摸鱼，什么苦恼和忧愁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那活蹦乱跳的鱼，是我童年金色的记忆，那带着腥味的水草，总弥漫在我的梦乡。

海牛和我的另一个梦（外一首）

□张幸福

这个冬天我被你细嫩的肋骨牵引，
埋在小小的屋内倾听你沉重的呼吸。
我张开笨拙的双臂，拨开缓慢的水，
任体内的海水潮汐般和你上下晃动。

是什么让你从不到深海，更远离岸边？
一旦离开水，你如孩子一样泪流满面。
我穿上铠甲，套层骨环把岁月停在风中，
谁是伤口，浪，那个谎言，一场漂泊。

你总是半躺在海上，一对偶鳍向前弯曲，
把小海牛抱在胸前喂奶。你深陷的小眼，
看不见我十年曲折的命。上升或下沉，
童年依旧，我还是你背上欢乐的骑手？

连着上唇，偌大的鼻子鼓着。你用你的方式，
把梦荡成水中的歌声。我在空空的育儿囊里，
孵出带壳的小骑手。我所携带的另一个冬天，
在你的尾巴结痂弯曲。我已藏好每一个伤口。

星光下的鲸鱼群

我看见一群鲸鱼游动时正星光灿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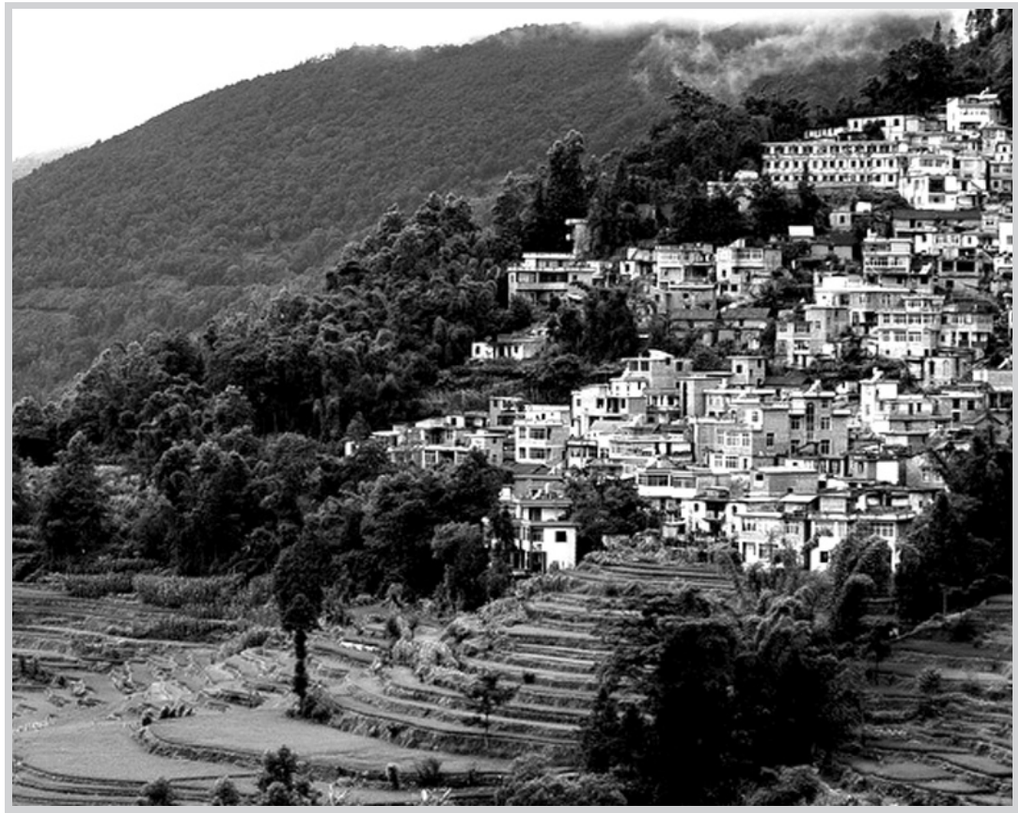
一只蛙以它的剪影蹲着，在鲸鱼的脊背上，
如一尊黑雕塑起伏在隆起的山。我看见，
金黄的节瘤布满鲸鱼的下颚，密密麻麻，
一粒粒黄金般闪动。当鲸鱼翻过庞大的躯体，
肚皮上的条纹在星光中荡漾，那是它们灌溉的腮。

喷水。一团气雾。我看见星光下的小鲸鱼，
举着小小的微笑，游在幽灵边。它们呼吸三次，
大海的花朵浇了三次水。它们的道发着光，我看见。

当它们抬头，划动两个白色长鳍，一个个跳着芭蕾，
我就浑身漆黑，在深海里为它们开门。那些腐烂的人，
一站在星光下，就游进鲸鱼一大一小的眼里。

像沉船在词里下锚，大海逐渐安静了我的羞辱。
鲸鱼们湿漉漉。瞬间套上第二副人的皮囊。一地星光。

我看见。



安静的村寨

生活中逐渐出现的一些事物

□苏 宁

公交车是我所生活的城市很后来的事物……这个“后来”，是我到苏北城市淮安生活几年之后的后来。妈妈第一次到这儿来看我，她从城里走了一圈，说了几件事，我至今记得。一是这城不像城，有城无市，早市夜市皆无；二是没有火车站，一个火车都不路过的地方可见其闭塞；三是满城没有一辆的士和公交车，出门，只有步行、自行车或者搭乘人力三轮车。另外，也没有让人自取货物的超市，没有机场。从城东到城西，一个人骑一辆自行车，二十几分钟，就是从东郊到西郊了。这是1995年左右的淮安城。街上看不到化妆的女人，也很少看到卖鲜花的店铺。人行路和车道之间没有显著标志。

可是，这有什么不好吗？少一些生活的便利而已，它更悠然，多了人间烟火的味道。后来，先是有了面的，6人座的黄色面的，上了大路就跑不起来，只是替人代步。再过了三两年，才有了现在见到的5人座的士。有了三三两两的的士，那6人座的黄色面包车逐渐淡出。1995年左右，家家以安一部电话为荣，我记得我到淮阴的第一件事，是安了一部电话，要排队预约来装，价格是3800多块，我至今还记得那个6位数的号码：316×××。每月还要有几十块的月租费。很多人装了，只为接，舍不得打，觉得有些贵。

那时我有一部黑白电视，500块一台的熊猫牌电视，可能也有几个台有节目可看。有一个天线，调台时还要转动天线，很奇怪的样子竖在电视上。因为我一直没有晚上看电视的习惯，它也就荒在那儿了，被我盖了块布。后来再打开，觉得还没坏，可就是一个台也找不到了，屏幕上全是雪花，在那儿沙沙地响。不知过了几年或是没多久，电话变成7位数，在3之后加了一个9。那几年，我接触的一个比较新的事物是，很多人有了寻呼机，很小的一个小盒子状的东西，可别在腰里，大约1000多块。这个东西我没有拥有过，不知用了是什么感觉，只是记得一开始只能显示数字，留下一个来寻呼的电话号码。后来，有了可以显示汉字的，我记得大约是4000块。可是，你要对那个人说的话或者信息，要通过技术支持，也就是通过寻呼台服务生传送过去，总有别扭的感觉。我想到了钱锺书那个关于情侣间书信的比拟。本来很热烈的话，经过这么一圈一绕，觉得什么话落到实地，都是不温不热也不美了，若是怒火，也早被降了度数。当很多人都有了一台寻呼机时，只要两三百就可以买到一台，我也没有买。那时，走在街上，我还不习惯谁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那个感觉。

再后来，电话又增加了一位数字，在开头的3之前加了一个8。当这个数字加上去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不用它了。我离开了城中心地带那个装了电话的房子，为了生活和读书的便利，我找了学校的宿舍楼去住。那是个小居室，除了可以放衣服，开火煮饭，一样电器也没有，一样先进的有时代感的东西也没有。我天性喜欢生活能够简单，又是赁屋而居，所以也没有采办一些时尚物品的想法。那段时间，我生活的周围出现了手机，好像这是1999年左右的事情。刚开始时的手机，还不可以发信息。没多久，如果记得不错，只是一年半年，就可以发送文字信息了。可我直到2002年左右，也就是“非典”之前，才终于有了一部手机。而我的电脑，比之手机，要早有一些。1997年年初，我买了第一台电脑，并一鼓作气，旁听了两节专教打字的课程。因为教学条件所限，并没有一人一台电脑可供学习的气派，只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不停地教大家背字根，学用五笔打字。学生多是成人，机关各单位的打字员。然后我那个电脑，不停地被我用出问题，一会换换这个零件，一会换换那个零件，换到最后，连屏幕也换了。据说原来的有辐射，要换一个可以保护眼睛的，为了眼睛，我当然要换掉不好的屏幕。最后，等我再搬一次家的时候，这台电脑就被我丢掉了。我费尽心力打好的没发的文稿，都放在磁盘里，但是忽然之间再没有这样可以放磁盘的电脑了。这些磁盘也就全不能用了，因为我的周围没有一台电脑可以打开它们。“磁盘时代”转眼过去，一下到了“U盘时代”。可很多年过去，电脑被灌输无数功能，我对电脑的使用也仅是用于打文字稿，其他功用概不了解。

后来，互联网时代全面到来。但我也是直到去年年初，才有了一个QQ号，同事自己申请的一个，看着好，要来的，因为他一个人有两三个。我用QQ的原因之一，是单位越来越多的同事面对面不爱多说话，讲话、发布文件、发送信件、交流工作多在QQ群中进行。我没有号码，很多消息还得通过口传纸授，自己也觉得没意思了。也就很自觉地向技术投降——要个号码，混进来了。

有了便利的数字通讯技术，我们的生活似乎也闹腾了。天涯若比邻，有了本质的进展和现实的依据。很多电器，比如空调、微波炉、烤箱、加湿器、空气净化机……慢慢地，也逐一挤进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可在我，有它们没它们，大体一样。所以，我一直没有成为生活中能追赶上时尚事物的一个女人。总是慢腾腾地、东张西望地生活着、迟疑着，观望着，好像不是生活的主人，只是来看人家怎么生活的一个旁观者。

好像是上一周，一个刊物的编辑从我博客上看到一篇文章，那是一篇关于读书的文章。编辑致电问我是否可以提供一张我所写的那本书的图片。书是朋友新出版的书，朋友也只是寄了我书，并无图片相赠。我至今不大会用相机，只好打电话向送我书的人要。朋友远在宁夏，几千里之遥。可几分钟之后，朋友就上线，用电子信箱把图片发了过来。我再打开电脑，将这个邮件转发。再过一天，报纸的电子版样刊已静静抵达我的邮箱。我由衷地用同一句话回复寄图片的朋友和发文章的编者：感谢通讯技术。

越来越多的小事件使我更加由衷地感到：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半径在无限增大，它不只是城市本身的大兴土木和扩建所带来的地理空间上的伸展。可是，我也有疑惑，这个社会越来越重的商业气息也使我们很多自以为重要的精神上的坚守，离我们仿佛越来越远。比如，今天的文学创作，我们所秉承的态度，是否还是曾经的样子？

当我现在低下头，在空白的笔记本上，一字一行写下这些字句，写下我对于外部事物的观察、体悟和分析，或者描述它们带来的生活变化时，内心是否还一如既往的宁静？文化和物质日益互相渗透、彼此侵犯的过程，是否是一个我们可以见证并左右的过程？我们身在其中，我们个人的微薄之力是将使它更融合，还是希望尽毕生之力，将它透澈地剥离、剖析清楚？我还没有答案。